



浙江近代图书 出版史研究

A study of Zhejiang modern book
publishing history

梁春芳 朱晓军 著
胡学彦 陈后扬

学习出版社

后期资助项目

浙江近代图书 出版史研究

A study of Zhejiang modern book
publishing history

梁春芳 朱晓军 著
胡学彦 陈后扬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 / 梁春芳等著. -- 北京:

学习出版社, 2014. 7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147 - 0448 - 8

I. ①浙… II. ①梁… III. ①出版事业 - 文化史 - 研究 - 浙江省 - 近代 IV. ①G239. 275.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6854 号

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

ZHEJIANG JINDAI TUSHUCHUBANSHI YANJIU

梁春芳 朱晓军 胡学彦 陈后扬 著

特约编辑: 杨庆文

责任编辑: 李 岩

技术编辑: 王晓勇

封面设计: 杨 洪

出版发行: 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 11 号新成文化大厦 B 座 11 层 (100062)

010 - 66063020 010 - 66061634 010 - 66061646

网 址: <http://www.xuexiph.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2. 75

字 数: 38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7 - 0448 - 8

定 价: 45. 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梁春芳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教授、编审。历任北方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编辑出版系主任；浙江工商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被授予黑龙江省优秀图书编辑、黑龙江省首届十佳出版工作者称号。获全国外国文学优秀图书编辑奖、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3年进入高校，从事编辑出版教学工作，任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指委委员。近年来，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主持浙江省社科规划办重点课题一项；出版专著一部，教材一部；在《中国出版》等杂志发表论文数十篇。

朱晓军 教授、编审、一级作家，在《中国出版》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3 篇，主持省部级重点项目 1 项，获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1 项，出版有《一个医生的救赎》、《高官的良心》、《让天说话》等文学作品 9 部，先后荣获鲁迅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新中国六十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中国短篇报告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任教于浙江理工大学。

胡学彦 老出版工作者。一直在浙江人民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退休后先后聘任为浙江省文史馆专刊《古今谈》的副主编以及《浙江省出版志》编委会副主编。著作有《作嫁集》、《作嫁二集》、《浙江历代版刻书目》等。

陈后扬 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曾任职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和浙江省出版事业管理局。参与编撰《浙江省出版志》，并担任副主编。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绪 言

浙江向被称为文物之邦、文化之邦，从图书出版事业即可见一斑。浙江的出版事业滥觞于唐穆宗时代，至今已有 1100 多年的历史。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引唐元稹为《白氏长庆集》所作序说：元稹和白乐天的诗被缮写模勒“卖于市肆”，“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雕版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板矣”。说明早在公元 8 世纪，浙江的雕版印刷已经起步，出版工作已具雏形。五代吴越国主钱俶佞佛，请永明寺（今净慈寺）高僧延寿主持刻印过大量佛经，在国内外传播。其实物至今犹存，如 1924 年杭州雷峰塔倾圮时发现的“陀罗尼经”，其经首镌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三行文字。吴越国大量刻印佛经，为宋代杭州的刻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宋，杭州一跃而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据程俱《麟台故事》载，当时朝廷中不少重要典籍，如“三史”、《资治通鉴》等均由皇帝下旨“就杭州镂版”。南宋建都临安（即今杭州），浙江的出版事业更加盛极一时，不仅有官家机构负责雕版刊印的书，即所谓官刻本，如国子监本（简称监本）、公使库本、郡斋本等，也有书坊刊行的书称坊刻本，私人出资刊行的书——称私刻本或家刻本；有的寺院也刻书。地域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可说遍地开花，有杭州本、衢州本、婺州本、温州本、明州本、台州本、绍兴本等名目。杭州是当时全国雕版印刷手工业的重要基地，聚集了一大批技术精良的刻工，对浙江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据史载，南宋绍兴年间，国子监复刊的《汉书注》，刻工有 120 名，孝宗时刻《仪礼疏》，刻工更多达 160 余名之众。

南宋临安已书坊林立。据叶德辉所著《书林清话》中说：“《潜志》（指宋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京城图，睦亲坊与近民坊并列，中隔御河……河有棚桥，故此一带街巷即以棚名……其时宗学多立于此，故近处多书坊，而陈姓尤盛。”^①陈姓书坊指陈起、陈思所开设的书坊。他们既售书又刻书，所刻书，不仅精致，书的规格也基本统一，行款均为10行18字，后人称为书棚本。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说到，南宋时，在临安城中像这样前店后坊式的书铺今尚有堂号姓氏可考的就有20余家。其他地方的书坊也不少，如婺州有10多家，庆元（今宁波）、绍兴、湖州、严州（今建德）、衢州诸府共有70余家。南宋150多年间，浙江的出版事业进入鼎盛时期，公私均刻印了很多书，其图书质量有不少已达到极高水平。

元代，虽然政治中心北移，朝廷中一些重要典籍仍交由杭州刊行。如至正五年（1345）中书省奉旨命令杭州刊《辽史》116卷、《金史》135卷。所刊《金史》，因为纸墨精湛，人称“世无其匹”。次年又把《宋史》稿飞马送杭州，依样镂造。大德三年（1299），元朝廷又下令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刊《大德重校圣济总录》200卷。延祐元年（1314），元仁宗嫌《农桑辑要》的初刻本字样不佳，下令江浙行省在杭州重刊，并一印再印，先后达万部之多。元代杭州西湖书院，所刊书名重一时。元人刻书多请名人写刻，如四明（今宁波）袁家所刻《清容居士集》50卷，用赵松雪体手写，被称为元版中上乘之作；至正二十六年（1366）婺州路儒学所刊《渊颖吴先生集》12卷，由名手宋璚誉写，古雅可爱。

明代，浙江的出版事业仍居全国的上游。不过地区之间已发生了变化，杭州的刻书就其数量而言虽不下于宋元，但在全国的地位已被列于金陵（今南京）、北京、苏州之后。吴兴（今湖州）在万历年间异军突起，成为全国彩色套印图书的重要基地。在万历、天启年间，以凌、闵两家为代表的湖州彩色套印本书兴起，令人刮目相看。凌、闵两家不仅以朱墨两色套印书籍，更出现了不少三色、四色甚至

① 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五色的套印本，所刻书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刻的戏曲、小说还附有各种插图。凌、闵两家套色刻印本，纸白笺细，彩色斑斓，其版式大体相同，以字体方正、行距疏朗、用纸考究为特色，被称为闵刻本或凌刻本。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朱墨套印，明启祯间，有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书最多者也……墨印朱批，字多流动。”“斑斓彩色，娱目怡情，能使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然刻一书而用数书之费，非有巨资大力，不克成功。”^①

万历中后期，杭州所刊插图本图书，也颇具特色。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杭州容与堂所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插图有200幅之多。著名的还有钱塘汪填修重刻的《三遂平妖传》、山阴李延谟延阁在杭刻的《北西厢记》、武林藏珠馆刻的《新刊徐文长先生评唐传演义》、陆云龙崢霄馆刻的《型世言》以及崇祯十年所刻的《吴骚合编》等等。其中不少插图为陈洪绶、蓝瑛等著名画家所绘，由著名刻工黄应光、项南洲所镌刻，精美绝伦。

明代浙江刻书尚有一个特点，即重视地方文献以及古人稀见书籍的整理与出版，刻了大批丛书。如杭州胡文焕所刻的《格致丛书》、钟人杰所刻《唐宋丛书》、何允中所刻的《广汉魏丛书》、海盐胡震亨所刻的《秘册汇函》、湖州茅一相所刻的《欣赏编》（即《重订欣赏编》）、宁波范钦天一阁所刻的《范氏奇书》、绍兴商濬所刻的《稗海》等等，使许多国家重要文献得以流传至今未遭泯灭，为祖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亡，进入清朝，浙江的出版事业迭遭劫难。当代著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黄裳在《清刻之美》一文中说：“康熙、乾隆之间的文字狱与销毁禁书，道光之间的太平天国战争，在典籍流传上是两个关键时刻。前者造成明清之间出版物的大量毁灭；后者使许多嘉道以还江南雕版中心地区在战火中遭遇损失。比较下来，乾隆、嘉庆两朝留下的印本就比较些。这就是清初刻本与某些道光刻本成为罕传

^① 叶德辉：《叶德辉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9页。

的罕见书的原因。”^①这段话是就全国范围说的，对照浙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浙江所受到的文字狱与禁书之危害，比其他省更甚，对出版事业所造成的影响更深、更广，一直到同光年间才逐渐有所改变。

清朝的文字狱案在浙江有“庄廷鑑史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文选案”、“齐召南案”、“卓长龄等诗集案”等。这些案件牵连人数之众，杀害人数之多，实属罕见。至今已过去 200 余年，人们想起，仍不免毛骨悚然，心有余悸。

乾隆后期兴起的大规模的禁书活动，其涉及范围之广，禁书之严酷，也史无前例，对出版事业的打击无异于雪上加霜。据台湾已故小说家高阳考证，乾隆于三十七年（1772）下了一道谕旨，要在全国搜访遗书乃起因于发现钱谦益所撰之《牧斋存学集》有“建夷”二字。遂决定大索天下之书，作一次全面的学术与思想检查。乾隆三十九年（1774）八月他又下了一道谕旨，说：“明季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辞，必有诋毁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四库馆总裁英廉给乾隆的奏折也可见端倪：“臣与总纂纪昀等公同商酌，以各书内有词义违碍者，业经陆续查出，分次奏缴销毁……随派纂修翰林戴衢亨、蔡廷衡、潘廷筠、王春煦、吴裕德、吴省兰、汪如洋、程昌期、吴舒帷、吴锡麒、孙希旦、陆伯焜、陈万青等十三员，将各省解送之明代以后各书，逐一严加检阅，详细磨勘，务将诞妄字句删毁净尽，不致稍有遗漏。兹据各该纂修等已全行阅竣，共看出应行销毁书一百四十四部，应酌量抽毁书一百八十一部。臣同该总纂纪昀等，遂加复核，理合开具略节清单，同原书三百二十五部，二千一百二十三本，一并缴进，请旨分别销毁。”^②乾隆发起编纂《四库全书》，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一种“文化统制”的手段，“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

① 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9 页。

②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商务印书馆 1957 年版，第 1 页。

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① 修改不了的，部分销毁，或全部销毁。乾隆对浙江尤其关注，在一谕旨中指出：“此等笔墨诋毁之事，大率江浙两省居多。”^② 因而对江浙查抄特严，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初四日特谕江苏、浙江和江西三省：“应禁之书，恐尚有存留之本，着传谕严飭所属，悉心查缴，解京销毁。”浙江巡抚罗琅奉谕诚惶诚恐，于五月十三日即上奏，说浙江过去虽共查办过10年，奏缴过24次，计书538种，“但浙江为人文渊薮，民间书籍繁多，实难保再无存留……兹奉谕旨飭查，惟有钦遵设法认真办理。臣现已通行各属，剴切出示晓谕，并督同司道府实力查办……一俟查有禁书，即随时奏明，解京销毁，务期查缴净尽，以仰副我皇上维持风教之至意。”^③ 这场费时20年的禁书活动，雷厉风行，对浙江出版事业的摧残，至深且钜。

黄裳上文还提到太平天国战争。太平天国战争对浙江最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当在咸丰末至同治初。当时战火蔓延至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双方你争我夺，战况惨烈，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出版事业也被波及，因而在较长时期内陷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咸丰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平静，浙江的出版事业逐渐走上正轨，建立了官书局，各府州县的书铺、书坊也逐渐恢复旧观。

鸦片战争是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不仅使我国在政治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在我国的文化界、思想界，也出现了新气象。一些先进人士放眼世界，经过观察、比较、思考，认识到英、美、法、德诸国之强于我，不只是因为拥有“坚船利炮”，还由于他们具有更高的文化，或曰文明。我们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避免亡国灭种之祸，就应该抛弃过去一些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面向世界，向西方学习。王韬、严复等开始办报刊，著文介绍西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等西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经典著作。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世变之亟》、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 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③ [清]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9页。

《原强》等文章,指出西方之所以强,乃在民主与科学。中日之战,中国失败,清朝廷迫于内外压力,在上层建筑层面也作了某些改革,如废科举等。但是对于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则仍坚持不改,因而最终被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所推翻。到了民国初年,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对世界形势看得更清楚。他们学贯中西,对我国国情也有深切了解。为了扭转国家命运,振兴中华,他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一方面强调开发民智,掀起启蒙运动,开展新文化运动。在那一段时间,我国的知识界、思想界真可说是意气风发,议论风生,反映在图书出版界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刘国钧在《中国书史简编》中说:“在这一时期,我国图书和出版事业出现了空前的发展:图书品种日益增多、出版数量日益高涨,出版物新类型(杂志、报纸、教科书等)的诞生、新印刷术(铅印、石印)等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出版企业的出现——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我国图书史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由于当时社会对新知识有着强烈的要求,各种政治党派有出版刊物的需要,原有的雕版印刷已不能适应迅速生产大量书籍的要求,因此新技术的应用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些民族资本家陆续开设新式印刷厂,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创立出版机构和发行机构,这也就为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新路。”^①

鸦片战争失败后,我国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

1843年宁波开埠以后,外国商人纷至沓来,一些传教士也来到中国。美国长老会原来开办在澳门的花华圣经书房,为了传教的方便,也为了宣传西方,迁移到宁波,并改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圣经书房采用西方的铅印技术,大量地印制《圣经》、《使徒行传》等宗教宣传品,也印制部分介绍西方新知识、新文化的书籍,不仅速度快、效率高,也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令国人刮目相看,从而对我国的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构成巨大的冲击。

^①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版,第97—100页。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欧美及日本等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我国迅速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广大人民饱受欺凌与奴役之苦，民不聊生。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文化的不断侵入，我国传统文化受到重大冲击，人民大众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具有社会使命感，如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他们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为挽救国家命运、振兴中华，大声呐喊。他们是那个时候一些重要报刊的创办者或积极投稿者。浙江最先引入西方新的印刷出版技术，各地报刊也如雨后天春笋般涌现，介绍新知识、新文化的图书逐渐成为图书市场的主角。它们对辛亥革命运动、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委员会于民国27年（1938）年底所作的调查，当时浙江各县共拥有新的印刷机构166处，在七八十年的时间内，出版事业已向现代化跨出了一大步。

民国时期，浙江图书出版业有了巨大进步，也遭受到反动派更多的压迫。据调查统计，民国元年至15年（1912—1926）北洋军阀控制时期，浙江被查封的报刊有22种之多，从业人员被杀害、被逮捕的更不计其数。著名报人邵飘萍即牺牲于192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舆论的控制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调查，从民国16—26年（1927—1937）这10年间被查封的报刊达27种，因出售进步报刊被勒令停办的书店有10余家，从业人员被杀害的更多，被关被通缉的数不胜数。抗战初期情况略有好转，中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更加严格，对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的迫害则变本加厉，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浙江虽然自古以来就文化发达，人文荟萃，在这个时期，其图书出版事业不仅与上海、广州等地比落后一大截，与其他省市比较，也大大滞后。《浙江通史》（清代卷）“导论”中说：“进入近代后，浙江经济和文化水平，在全国各省区虽然仍可侧身前列，但其发展速度与某些省区相比，则相对缓慢了。浙江的三个通商口岸发展都不顺利；浙江作为主要丝茶产区之一，其生产长期滞留在旧式手工劳动的生产水平，未能迅速转向机器生产；浙江新式工业的产生，要比沪粤等地区迟得多；文化教育和新闻出版事

业也大致如此。^①这一段话十分中肯。浙江近代的图书出版业曾连续掀起两个高潮：在辛亥革命前夕及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报刊蓬勃发展，对推翻清政府、开发民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抗战初期，金华、丽水一带一度成为东南文化中心，图书出版业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为时均不长，昙花一现而已。在民国时期，浙江图书市场上多属上海版的各类图书，在学校里也以上海版的教科书为主，浙江版图书式微了。这种情况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有所改变，浙江的图书出版业才又迈上兴盛的道路。

图书出版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活动，在积累文化遗产，促进并推动各类学科的发展，推进人类文明方面，功勋卓著。因而对图书出版业的研究一直有人在做。我国2000多年前的汉代就出现了目录学，如汉刘歆所撰《七略》，以后又有了文献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等。浙江古代的图书出版业繁荣昌盛，有辉煌的历史，因此对浙江图书出版业进行研究的人也不少。据笔者所知，已经出版的专著就有《浙江省出版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版）、《浙江省出版史研究——中唐五代、两宋时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7月版）、《浙江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浙江历代版刻书目》（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等。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浙江通史》、《浙江文化史》，以及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出版通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本中国图书史》、辽海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以及华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等书中，对浙江的图书出版业也多有涉及，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一些专业杂志及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少。

本书探讨的是浙江出版业的近代部分，也就是晚清民国时期。我们知道，晚清民国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一个天崩

^① 金普森、陈剩勇、汪林茂：《浙江通史》（清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页。

地坼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一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我国人民经过100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推翻了在我国持续2000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统治；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时期对我国的出版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变的时代，革故鼎新，承前启后的时代。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长老会在浙江宁波建立的华花圣经书房，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新型的出版印刷技术，使我国传统的旧的雕版印刷技术相形见绌，新型的铅印技术、石印技术逐步取而代之，于是把我国的出版业推进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在这个转型时期，浙江的文化人和出版人，蒿目时艰，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纷纷走出书斋，投身到变革实践中去。他们一方面参与各种革命斗争，同时又积极学习和运用西方先进的出版印刷技术，采用新的图书形式——报纸、刊物和新型图书，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民主、平等、自由等新思想、新观念以及声光化电等新知识，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与民众联合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其中如章太炎、秋瑾、鲁迅、张元济等人，既对我国国情有深切了解，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洞察世界局势，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敢为天下先，为民前驱，为广大学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每当国家变革的关键时刻，浙江总有一批人出来，义不容辞地参加到革命队伍中去，并以笔为刀，冲锋陷阵，杀敌救国。所以，在晚清民国时期，浙江的出版业曾出现几次高潮，不仅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促进了文化事业和出版事业的发展。

本书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又参考了相关各种专著，对浙江在这个时期的图书出版事业进行了梳理，初步勾勒出其发展的框架，按鸦片战争前后，咸丰——光绪年间，辛亥革命前夕、民国初期、中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顺序，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我们发现，近代浙江的图书出版事业，与上海、广东等先进省市比较，虽然其转型速度不够快，发展得也不够充分，但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是位居前列，到民国时期，无论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发行机构，都已实现了现代化。更可贵的是，浙江的文化人和出版人，在宣

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一直走在前面。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就是首先在浙江完成，而后送上海出版的。浙江革命根据地在国民党严密控制、物质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办起不少出版社，出版了不少为广大工农兵干部和革命群众喜爱阅读的报刊和毛主席著作等，为浙江的出版业做出了榜样，指明了发展的方向。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承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等单位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珍贵书影，特此致谢。

目 录

第一章 从噩梦中醒来

——浙江出版业走出黑暗期 (1)

第一节 浙江出版事业开始踏上复兴之路 (1)

一、浙江出版业复兴的契机 (1)

二、道光年间的官刻书 (2)

三、私家刻书鸟瞰 (3)

第二节 清政府对出版业的管理 (8)

一、清政府所订的出版法规 (8)

二、清政府查禁图书 (10)

第三节 新型出版机构的出现——宁波华花圣经书房 (11)

一、浙江出现最早的新型出版机构 (12)

二、华花圣经书房对浙江出版事业的贡献 (13)

三、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促进中国出版业的改革 (15)

第二章 浴火重生

——晚清各地出版业日趋繁荣 (17)

第一节 官刊书——浙江书局独领风骚 (17)

一、浙江地方官署刊书 (17)

二、浙江书局刊书 (18)

三、浙江书局刊书要目 (20)

四、浙江书局刊书的特色 (26)

第二节 杭州及各府县私人刊书概况 (27)

一、杭州地区 (27)

二、宁波地区 (35)